

【政治经济学】

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

蒂齐亚纳·泰拉诺瓦 著 杨嵘均 曹秀娟 译

【摘要】《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是研究数字劳动的经典文献。在本文中，泰拉诺瓦首次提出“数字劳动”这一概念，并将“数字劳动”囊括到更加广泛的“免费劳动”的概念中。在她看来，免费劳动普遍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互联网中存在的免费劳动已经成为一种典型劳动形式。具体看来，泰拉诺瓦认为，用户在互联网中软件编程、发送邮件、参与游戏等自愿、无偿的行为都是在进行免费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形式已经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泰拉诺瓦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免费劳动从文化知识的消费转化为生产性活动，不能将其视为资本逻辑的延伸，而应当注意到其中体现的资本主义内部复杂的劳动关系。

【关键词】数字媒体；免费劳动；数字经济；知识阶级；非物质劳动；文化生产

【作者简介】蒂齐亚纳·泰拉诺瓦，意大利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

【译者简介】杨嵘均(1973-)，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秀娟(1998-)，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201620)。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前沿》(沪)，2023.1.53~69

【基金项目】本译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符号消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20BZZ002)的阶段性成果。

数字媒体产业的劳动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有趣。与“网奴”同名的网络杂志正在不断抨击这类工作无耻的剥削本性、令人力竭的劳动节奏以及残酷的雇佣临时工制。他们谈论“24—7全天候的电子血汗工厂”，控诉每周90小时的工时以及“新媒体公司的低能管理”。1999年初，美国在线(AOL)15000名“志愿者”中，有7人要求劳工部调查美国在线是否亏欠他们多年来免费担任聊天主持人的酬劳，此举打翻了“信息的爱船”(info-love boat)。^①过去，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劳动并热爱这一行，但现在他们开始感受到被数字媒体灼烧的痛苦。上述事件是对美化数字劳动的必然反击，凸显了数字劳动与现代血汗工厂之间逻辑的连续性，并表明知识劳动正在衰退。然而，“数字经济”中的劳动问题，不能被简单地误认为资本主义为人熟知的剥削逻辑的创新发展。“网奴”不仅是互联网中一种典型劳动形式，还包含一套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复杂劳动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我把这种劳动关系理解为“免费劳动”的规定，这是整个文化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重要却被低估的力量。本文将互联网视为免费劳动发挥基本功能的具体实例，意在突出“数字经济”与意大利自治论者所称的“社会工厂”之间的联系。“社会工厂”描述了一个过程：“劳动过程已经从工厂转移到社会，从而开启了一台真正复杂的机器。”^②网络上的免费劳动包括建立Web站点、修改软件包、阅读并参与邮件列表，以及在MUD和MOO^③上构建虚拟空间的活动，这些活动既是自愿提供的，也是无偿的，既是享受的，也是被剥削的。互联网远非一个“脱离现实的”虚无空间，而是自始至终由文化劳动、技术劳动赋予活力，以此进行持续的价值生产，这一过程完全依附于整个网络化社会的流动。

然而，对上述论点的支持却因批判理论近期的发展而复杂化。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30年的破坏工

作后,我们该如何谈论劳动,尤其是文化劳动、技术劳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赛博格宣言》中体现的后现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postmodern socialist feminism),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批判理论反感马克思主义劳动分析的一些深层原因。哈拉维明确反对理论家们的人文主义倾向,这些理论家认为劳动“是一种特殊的范畴,能够使马克思主义者克服幻想并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劳动是改变世界所必需的”。^④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同样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的分析不足以描述奴隶后裔文化的不满,这些奴隶后代将艺术表达视为“实现个人自我塑造和集体解放的手段”。^⑤如果劳动是“造就人(白人)的人文活动”,那么,毫无疑问,人文劳动并非真正属于网络化的后人类智能时代。

哈拉维在《宣言》中提及的“统治信息学”(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无疑以控制论、劳动和资本三者的关系为研究重点。在《宣言》出版后的15年里,这种三角关系变得更加明显。互联网的扩张为劳动力灵活性的提升、不断的技能再培训、自由职业以及诸如“额外工作”(将附加的工作从传统办公室带回家)实践的推广,诸如此类的当代走向提供了意识形态和物质支持。^⑥广告活动和商业手册表明,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去中介化”的场所(象征了著名的中间商之死,从书店、旅行社到电脑商无不体现),而且也是一种灵活的集体智能形成的途径。

本文并非尝试对互联网带来的“影响”做出评判,而是旨在厘清互联网与自治论者所言“社会工厂”之间的联系。我所关注的是“外联网”(outer net)——将社会、文化、经济交错其中的网络系统,优于互联网——如何将互联网与更大规模劳动、文化和权力流动联系起来。本文的根本目的是要超越网络空间是对现实的逃避这一观念,以便理解互联网的现状如何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文化劳动以及技术劳动是互联网的核心,同时也是贯穿整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活动。我认为,这种劳动并非专属于所谓的知识工人,而是后工业经济的普遍特征。这种生产的普遍性对生产与消

费、劳动与文化之间固有区分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它也破坏了吉尔罗伊将劳动作为“奴役、痛苦和从属”与将艺术表达作为自我塑造和集体解放的手段之间的区分。然而,生产与消费、劳动与文化表达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并不意味着重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异化的工人。互联网并不能自动地把每个用户变成一个活跃的生产者,把每个工人变成一个创造性的主体。在免费劳动的范畴内重新确立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标志着一种不同的价值逻辑展开,其运作需要仔细分析。^⑦

一、数字经济

近期,出现了用“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一词概括上述主题的一些过程。作为一个术语,数字经济似乎描述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一面是与后现代文化经济(媒体、大学和艺术)相交错,而另一面又是与信息产业(信息和通信综合体)相交织。如此两种不同生产领域的交叉在理论和实践参与上构成了对劳动问题的挑战。与政治经济学中所有权问题和文化研究中消费问题相比,劳动问题已经成为媒介研究的边缘问题。

在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的定义中,数字经济是以出现新技术(计算机网络)和新型工人(数字工匠)为特征。^⑧根据巴布鲁克的说法,数字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包括公共因素(国家对产生阿帕网(Arpanet)原始研究的资助,对在塑造互联网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术活动的财政支持);市场驱动因素(后来者则试图通过重新引入商品化抢占数字经济高地);还有礼物经济因素——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优势的真正表现,为其最终战胜未来的“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o-communism)做好准备:

在发达国家,大多数政客和商界领袖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于信息的商品化……然而,在新兴信息社会的“优势”在于,货币—商品关系在实存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形式所创造的关系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网络是工作、娱乐、恋爱、学习和与他人讨论的地方……他们不受物理距离的限制,在没有金钱和政治直接中介的情况下相互合作。他们不关心版权,提供和接收信息时也不考虑

付费。在没有国家或市场来调节社会纽带的情况下,网络社区反而是通过时间和思想的馈赠所产生的相互义务而形成。^⑨

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Marxist-Hegelian)的角度来看,巴布鲁克认为高技术礼品经济(high-tech gift economy)是一个从内部克服资本主义的过程。高技术礼品经济的出场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它超越了新左派DIY(do-it-yourself)文化的纯粹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家的新自由主义:“货币—商品和礼物关系不仅相互冲突,而且也共生共存。”^⑩礼品经济的参与者并非不愿意利用市场资源和政府资金来追求自由交换的赠礼经济(potlatch economy)。可是,赠送礼品最终仍然与经济相对立,市场经济总是威胁着将礼品经济公有领地私有化。在巴布鲁克看来,商品化,即财产制度的重新定位,是资本主义试图将网络无政府共产主义重新纳入己方阵营的主要策略。

我认为,巴布鲁克过分强调了高技术礼品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的自主性。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交换过程,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在经济优势的重新出现,而且也是在共产主义似乎被击败的那一刻一个被压抑的他者的重新出现。重要的是要记住,作为范围更广的数字经济的一部分,礼品经济本身就是晚期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力量。正如我们后文将会看到的,提供“免费劳动”是数字经济中创造价值的一个关键部分。正如即将阐明的那样,使免费劳动成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条件建立在困难重重的试验性妥协之上,这种妥协介于植根在历史文化对创新生产的情感欲求——通常与吉尔罗伊强调的是“个人自我塑造和集体解放”联系在一起,与当前强调的知识作为价值增殖主要来源的资本主义之间。

美国在线的志愿者、“网奴”和业余网页设计师不劳动,仅仅是因为资本希望他们这样做;他们正在表现出一种对情感和文化生产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社会塑造的。资本发展超越了早期工业和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使得支持数字经济的文化、技术和创新劳动成为可能,因此,在那些后福特主义已经发挥了几十年作用的地区表现得

尤其充分。在超发达的国家(overdeveloped countries)里,工厂倒闭说明过去的工人阶级过时了,但一代又一代的工人仍然在被创造,他们一再被视为重要商品的活跃消费者。免费劳动将这种对文化的知识性消费转化为生产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被欣然接受,但同时也常常被无耻地剥削。

管理理论也越来越关注知识劳动的问题,知识劳动难以衡量的标准对于激励创新和实现竞争目标的过程至关重要。例如,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管理文献的经典例子《数字经济》中,将数字经济描述为“基于人类智能网络的新经济模式”。^⑪人类智力提供了急需的价值增值,这对组织的经济健康来说至关重要。然而,人类智力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它不能和更传统的劳动类型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管理。知识工人需要开放的组织结构来进行生产,因为知识的生产根植于协作,也就是巴布鲁克所定义的“礼品经济”:

监督和管理理念正在向以团队为基础的结构发生转变。任何负责管理知识工作者的人都知道,他们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他们往往拥有管理层无法匹敌甚至是无法理解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管理层面临的一个新挑战首先是通过向他们推销组织来吸引和保留这些资产,其次是提供创造性和开放的沟通环境,让这些员工能够有效地应用和提高他们的知识。^⑫

因此,对泰普斯科特来说,数字经济神奇地解决了工业社会的矛盾,例如阶级斗争。而在工业经济中,“工人试图通过休闲来获得满足感……与其他人拥有和控制的生产资料疏远了。”^⑬在数字经济中,工人通过工作获得了成就感,并在她的大脑中找到了自己的、未被异化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需要通过鼓励员工参与到一种交流文化当中来培育,这种文化流动主要保持在公司内部,但也需要涉及“外部”,即与快速发展的知识世界相接触。大会、展览和会议——支持这种一般性交流的更传统的方式——得到了公司内外的网络技术的补充。尽管需要监控这些知识流的流量(因此公司担心内部网的使用),但互联网有效地发挥了作为“人类智力”更新

其生产能力渠道的作用。

本文不同于管理学文献的过分渲染。当然,也未止步于巴布鲁克作品中的一些概念限制。本文关注的是,在关于数字经济的辩论中一些可能同时共存的解释。一些说法认为数字经济是抵抗的运动,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全新价值提取机制的功能得到发展。管理专家所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的终结与左派话语所预示的礼品经济是一回事吗?

我们可以通过将数字经济的标签从高级劳动形式这一独有地位中剥离,来打破争论的僵局。本文将数字经济描述为一种内部“捕获”更大的社会和文化知识库的特定机制。数字经济是价值和自由文化/情感劳动实验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与特定的生产形式(例如:网页设计、多媒体制作、数字服务等)有关,但也与我们未能立即认识的劳动形式有关——聊天、拍摄纪录片、创建邮件列表、业余通讯,等等。这些文化劳动和技术劳动的类型不是资本主义以任何直接的因果方式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资本的经济需求。然而,这些劳动类型却是随着文化产业的扩张而发展起来,是经济尝试过程的一部分,是从知识/文化/情感中创造货币价值。

这一观点不同于左翼流行的观点,即上述过程关于原生文化片段的整合(incorporation)。因此,这并不是关于资本这坏小子进入到“地下”亚文化或次文化当中,并将他们的生产成果(风格、语言、音乐)“整合”进“媒介”的食物链中。这个过程,通常被认为是特定文化形成的终结,或者至少是其“原生”阶段的结束。在合并之后,当地文化被拾起并在全球传播,从而导致了文化混生或文化帝国主义。

与其说资本从外部“整合”了集体想象的原生成果,毋宁说文化流动始终发生在资本主义领域内似乎更合理。整合并不是资本对原生文化的侵蚀,而是一个更为内在的过程,它将集体劳动(甚至是文化劳动)引向货币流动,并在资本主义商业实践中加以结构化。

几十年来,亚文化运动已经塞满了跨国资本主义的腰包。受早期文化消费的熏陶,亚文化为销售

服装、光盘、视频游戏、电影和电视广告位提供了外形、风格和声音。通常,这是通过亚文化成员积极参与文化产品的生产(例如,音乐中的独立标签,时尚界的小型设计师商店)来实现的。^④顾名思义,这种参与是一种自愿的参与,尽管它经常伴随着售罄的叫喊声。集体文化劳动的成果不是简单地被占有了,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商业实践中被自愿引导和有争议地建构起来的。在这些运动中,文化、文化产业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比“整合”概念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经济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尝试中一个新的阶段。

二、知识阶级和非物质劳动

尽管许多人对互联网的民主潜力或多或少只是违心地支持,但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之间似乎过于紧密的联系,让关心这一问题的政治家感到不安。通过指出计算机网络如何成为信息资本的物质基础以及意识形态核心来反驳天真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令人跃跃欲试。电视广告和平面媒体所描绘的互联网,似乎不仅是资本不断寻找新市场的最新体现,而且也是一个完全制造共识的机器,它使大量无产阶级知识工作者社会化,以融入持续创新的经济中去。^⑤毕竟,大肆宣传表明,如果我们不尽快上线,我们将变得过时,变得不被需要,会被弃之如敝屣。如果我们照做,我们则会被承诺成为“蜂巢思维”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由网络智能主体组成的非物质经济,负责加快资本“不断涌现的分支创新浪潮”^⑥的节奏。多媒体艺术家、作家、记者、软件程序员、平面设计师和活动家与大小公司共同组成这一生产的核心。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它的文化精英,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不过提供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劳动形式。^⑦因此,可以看到,数字工人存在抵制或支持资本项目两种态度,这通常与他们在网络化、水平化、分层化的知识劳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直接相关。

因此,对互联网具备的政治潜力进行的任何判断,不仅与它大肆吹嘘的允许分散访问信息的能力有关,而且也与谁使用互联网以及如何使用互联网的问题有关。如果网络的去中心化结构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它的人口构成。因此,关于

互联网用户的使用情况、收入、性别和种族的统计数据层出不穷,这是世界上民意调查最多、探索最多、但也不透明的调查材料。如果这群互联网用户主要是由“知识工人”组成,那么他们是被视为精英文化和经济权力的拥有者,还是被视为不能自然而然确保自身精英地位的新型劳动力配置先驱者,这一问题就很重要了。

正如本文所说,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也容易将人引入歧途。因为我们必须先询问谁在参与数字经济,然后才能对其做出判断。这个问题将人们引入歧途。因为它暗示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在“阶级”范畴中定位知识工人,只要知道它属于哪个阶级,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互联网具备的政治潜能。如果我们能证明知识工人是先驱者,那么互联网就成了一个抵抗的场所;^⑧如果我们能证明知识工人在信息社会中行使权力,那么互联网不过是中产阶级社区的延伸。^⑨即使承认知识工人在等级和地位方面的确存在分裂,也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它仍然会导致一个简单的分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互联网会成为知识阶级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斗争领域。

由于评判“知识”的标准难以量化,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知识不能完全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虽然从工厂劳动到办公室劳动、从生产劳动到服务劳动的转变已广为人知,但尚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有资格被称为知识工人,而另一些人则没有。^⑩“知识工人”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社会学范畴。

然而,一个更有趣的思路是,不要在可量化的因素中寻找知识阶级,而是专注于“劳动”。虽然阶级的概念仍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人们从经验上理解具体历史主体不可或缺的概念,但它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固化”了主体,就像化学周期表中的某种物质,一个人出生时是某一种元素(工人阶级的金属),但如果经过适当的炼金过程(教育和收入),就可能会变成其他东西(中产阶级的硅)。这种对阶级的理解,也使组织劳动力的文化以及金钱的流动固化了。就使用互联网而言,我上文的描述,既得到普遍认同,也得到了批评。因为我并没有解释或理解

互联网用户的异质性和共同性。因而,我发现,从意大利自治论者,尤其是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所描述的非物质劳动的角度来思考会更有见地。对拉扎拉托而言,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指的是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

一方面,就商品的“信息内容”而言,它直接指工人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直接劳动所涉及的技能越来越多地涉及控制论和计算机控制(横向及纵向通信)。一方面,就产生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而言,非物质劳动包括一系列通常不被认为是“劳动”的活动——换句话说,这些活动包括定义和确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以及更具策略性地引导公众舆论。^⑪

与知识工人不同,非物质劳动并不完全局限于特定的阶级构成。拉扎拉托坚持认为,这种劳动力形式不仅限于高技能工人,而且是后工业社会中每个生产主体的一种活动形式。在高技能工人中,这些能力已经存在。然而,在年轻工人、“不稳定劳工”和失业青年中,这些能力是“虚拟的”,即他们存在但仍未确定。这就意味着,非物质劳动是一种虚拟性的存在(一种未确定的能力),整体上属于后工业时代的生产主体。例如,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强调,可以被解读为试图阻止这种虚拟性消失或阻止其被引导至权力结构尚未涉足的地方。尽管发达的资本以及资本与结构性失业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但后现代政府并不喜欢完全失业的人。劳动的潜能必须保持活跃,失业者必须接受持续的培训,以便作为某种后工业后备力量受到监控并保持活力。也不允许他们将精力投入到试验性的、游牧式的、反生产性的生活方式当中,这种生活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英国受到了《刑事司法法》的猛烈抨击。^⑫然而,与后福特主义者不同,根据自治主义起源,拉扎拉托并不认为非物质劳动纯粹是对资本主义新的历史阶段起作用:“这种能力的虚拟性既非虚无缥缈,也非没有蕴含历史意义;相反,它是一种开放,是一种潜力。它的历史起源和前身是福特主义工人的‘反工作斗争’,以及最近的社会化、教育形成和文化自我增殖过程。”^⑬

非物质劳动的出现,使“知识工人”作为“工业”意义上的阶级这一想法存在问题。非物质劳动作为劳动力的集体素质,可以理解为以不同程度的情感冲动渗透到社会主体中。这种情感冲动,在“生成”资本主义形态特征的过程中产生,这种资本主义形态根据利润逻辑分配价值。^①如果说知识本质上是集体的,那么在后现代文化经济的情况下它更是如此:音乐、时尚和信息都是集体生产的,但会有选择性地得到补偿。在时尚和音乐领域中,只有部分公司能进入企业分销链;只有少数网站是风险资本所投资的。然而,正是非物质劳动作为一种集体文化劳动的形式,才使得这些产品成为可能,即便利润被老牌公司过大比例地占有。

如此看来,互联网并未脱离促成“集体智能”实现这一众所周知的信条。互联网表明非物质劳动体系确实存在,并且推动其积聚成一个集体的实存。互联网中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能力,包括写作、阅读、管理和参与邮件列表、网站、聊天热线等的工作。这些活动不属于“抽象劳动”的概念,马克思把“抽象劳动”定义为花费时间生产价值的劳动,而不考虑产品的有用性。^②这些活动见证了欲望对生产的投资,而文化理论家主要将其与消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在各类评论员看来,这种生产活动的爆炸性增长,受到少数群体、性别、种族特征等因素的削弱。然而,我们也可以辩解,承认非物质劳动存在,将其视为后工业劳动整体的一种分散、集体的特征,并不否认知识(技术和文化)等级制度的存在,这些知识等级预设(但不决定)此类活动的性质。这些等级,决定了这些虚拟性成为现实的程度。也就是说,它们从潜在到被实现的过程,即构成文化、情感和技术生产的时刻。无论是资本还是活劳动,都不需要永久排除在非物质劳动可能性之外的劳动力。但这也是他们欲望不再重合的地方。资本想要保持对这些虚拟性的展开和价值增殖过程的控制。因此,网络上相对丰富的文化、技术、情感生产,并不是作为一个放任自流的后工业乌托邦而存在,而是与晚期资本主义相互建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其作为全球风险资本而表现。

三、集体思维

网络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式陈述,简化了网络化、非物质劳动的集体性质。例如,在《失控》一书中,凯文·凯利(Kevin Kelly)颇受欢迎的论点是互联网是一种集体的“蜂巢思维”。根据凯利的说法,互联网是广泛存在于技术、自然和社会系统中的自组织原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互联网既是相互连接的人类思维表现的自组织性,也是无限生产活动存在的物质证据。^③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皮埃尔·列维(Pierre Levy)利用认知人类学和后结构主义哲学来论证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是促成“集体智能”出现的场所。根据尤金·普罗文佐(Eugene Provenzo)的说法,由于(Levy)受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等早期计算机先驱的启发,列维主张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它融合并扩大了自我认知和集体思维的范围。”^④根据列维(Levy)的说法,我们正在从一个基于单一的“我思故我在”(我认为)的笛卡尔思维模式,转变为一个集体或多元的思考共同体(我们认为):

什么是集体智能?它是一种普遍分布的智能形式,不断增强、实时协调,并导致技能的有效调动……集体智能的基础和目标是个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和丰富,而不是拜物教或对实体化社区的崇拜。^⑤

与凯利一样,列维将他的论点置于竞争和灵活性的共同修辞中。这种修辞,主导了围绕数字化的霸权话语:“我们越能形成智能社区,作为具有主动性、想象力和反应迅速的思想开放的认知主体,我们就越能确保我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取得成功。”^⑥在列维看来,数字经济凸显了在自动化过程中吸收智能的不可能性:与第一波控制论将工人赶出工厂不同,计算机网络突出了人类智能作为知识经济中真正的价值创造者的独特价值。在他看来,由于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创造性主体性的生产,这种生产极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并赋予人类创造潜能以中心地位。

尤其是在凯利的例子中,人们很容易将“蜂巢思维”和作为自由市场的自组织互联网视为狂热资本主义的胡言乱语。从有毒的硅芯片工厂到美国在线

的电子血汗工厂,在那里,技术工作被降级,工人被淘汰的现象十分严重,数字资本家对高技术行业的劳动现实视而不见,这不禁让人深感愤怒。^③我们如何才能坚持,文化生产和非物质劳动在互联网中是集体存在的(包括内部和外部),而不去赞同那些数字精英理想主义的网络狂欢?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观察开始:网络文化思想的自组织、集体智能捕捉到了网络化非物质劳动的存在,但也抵制了资本的运作。毕竟,资本是集体智能在其中得以实现的非自然环境。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特殊动力的一部分,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网络智能的集体维度。认同后葛兰西时期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大利学者们通过关注工厂倒闭后劳动所经历的嬗变,一直关注这种关系。自组织的“集体智能”这一概念与他们的核心概念之一“一般智力”惊人地相似,这是自治论者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核心思想(如果不是实际措辞的话)“提取”出的概念。虽然“集体智能”或“蜂巢思维”抓住了“一般智力”的一些精神内核,却也消除自治论者对“一般智力”与资本关系进行理论批判。

在自治主义者最喜欢的文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尤其是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认为,“知识——首先是科学知识,但不完全是科学知识——正是由于它的生产自主权而恰恰不亚于主要生产力,从而将重复劳动和分工劳动置于剩余的位置。这里正在涉及知识的……已经变成了化身……在机器的自动化系统中。”^④在鲜活的“机器论片段”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他者”将工业机器系统描述为一个由金属和肉体构成的可怕怪物:“生产过程已不再是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⑤

从这些章节中,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提取了“一般智力”的概念,即“知识的集合……构成了社会生产的中心”。^⑥然而,与马克思最初的构想不同,自治主义者摒弃将一般智力视为地狱般机器的现代主义形象。他们声称,马克思完全将一般智力(或作为主要生产力的知识)与固定资本(机器)等同起来,因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般智力不能独立于协调机器之间相互联系的具体主体而存在。一般智力是固定资本(机器)和活劳动(工人)的结合。如果我们把互联网和一般的计算机网络看作是最新的机器——固定资本的最新表现形式——那么不难想象,在今天一般智力仍然很活跃。

然而,自治主义者并没有停止将一般智力描述为处于后工业生产核心的人类和机器的集合。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由金属和肉体构成的怪物,将会更新为一个跨越世界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计算机利用人类作为一种让机器系统(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运转的方式。马克思主义描述的视觉权力被黑客们身体寸步不移的赛博朋克快照所更替,脐带般的电极将它们连接到矩阵,人们仿佛附属于此个活生生的、全能网络空间。除了丰富的特效,《黑客帝国》的票房成功,也证实这种转向的偏执解读开始流行。

对于这种描述中隐含的人文主义,自治主义者反对“大众智能”的概念。从功能上看,活劳动是形成一般智力的关键。大众智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社会主体——“是生活主体及其语言合作的不可分割的知识宝库……知识的重要部分不能存放在机器中,但是……它必须作为劳动力的直接互动而产生。”^⑦正如维尔诺(Virno)所强调的,大众智能与知识工作者的各种角色无关,它是“后福特时代整个社会劳动力的一种品质和独特标志”。^⑧

集体智能在管理学文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普遍存在,这可以看作是在信息社会中对劳动的质共同直觉的结果。知识劳动本质上是集体的,它始终是知识的集体和社会生产的结果。^⑨资本的问题在于,如何从这片丰富而又略显棘手的领域中提取尽可能多的价值(用自治主义者的术语来说,就是

“增殖”)。

因此,集体知识劳动与那些在知识行业劳动的人无关,也与就业无关。承认劳动的集体性就意味着拒绝劳动和就业之间的等价性。这一点已经由马克思提出,并进一步被女权主义者和后葛兰西的自治主义者所强调。^⑧劳动不等于有偿劳动。这样的理解,可能有助于我们拒绝一些关于失业的可怕言论。这些言论,将失业者变成工业化国家政府大力支持、推动和督促的对象。失业者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失业者。但事实上,他们是维持“地下”困难经济的生命之源。他们从事低薪工作,其中一些也进入了新媒体行业。^⑨强调劳动如何不等同于就业,也意味着承认免费劳动、情感劳动和文化劳动——无论是新媒介产业还是旧媒介产业,都尤为重要。

四、转瞬即逝的商品和免费劳动

就文化劳动和情感劳动的关系而言,新旧媒体之间,既存在一种连续性,也存在一种断裂。这种连续性,似乎在于它们对公众/用户作为生产主体的共同依赖,区别既在于生产方式和权力/知识在这两种类型中的运作方式。虽然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其中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强调公共服务——举个例子,电视行业总是相对保守:作家、制片人、表演者、经理和技术人员在一个仍然由少数老牌商家经营的行业中有明晰的定位。电视作为一种构建国家认同的技术的历史遗产,也意味着电视总是以某种方式被更公开地追究责任。

相反,这并不意味着,旧媒体不利用免费劳动力。例如,电视和印刷媒体充分利用了观众/读者的免费劳动,但无论是在经济组织还是道德判断方面,它们也倾向于更严格地构建后者的贡献。为所有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电视体验所付出的代价,通常是大量的道德恐慌:犯罪分子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必须通过强硬的警察行动来制止;狂野的青少年缺乏自尊,需要严厉的爱来管教。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互联网上,那么为什么互联网并不是它的辩护者所声称的去中心化的、分散的和令人愉悦的文化生产的“幸福岛”呢?

对于这些问题,最明显的答案自然而然地出现

在早期的互联网用户身上。他们将其归咎于互联网的商业化。电子商务和逐步私有化被指责扰乱了互联网的免费经济。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将这种交换经济称为“礼品经济”。^⑩事实上,也许互联网可能会与现在不同。然而,资本主义能够永远置身于网络之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种对其自身组织结构至关重要的交流模式。

资本和互联网之间明确建立联系的结果是数字经济,它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加速的所有迹象。可能是互联网还没有稳定下来,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经济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快、最明显的生产区域。新产品和新趋势以令人焦虑的速度交替出现。毕竟,这是一个你需要每年更换设备/知识,甚至可能是员工的行业。

在某种程度上,数字经济的速度、它加速淘汰的节奏以及它对(大部分)“非物质”产品的依赖似乎符合后现代对商品状态变化的直觉,商品的本质被认为是有意义的(或缺乏)而不是劳动(好像两者可以分开)。^⑪不断抱怨互联网导致现实的消失,既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又是基于重构商品的后现代虚无主义。^⑫超现实证实了一个社会没有人文关怀的人文主义噩梦,这是进步主义接管象征领域的顶峰。网络上的商品,不仅不是物质的,而且相对于“真正的”社会需求的极限而言,它也是过量的——有太多的物质、太多的网站、太多的混乱和噪声。

然而,商品的消失可能不是物质的消失,而是它明显地屈从于其背后劳动的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本身并没有消失;相反,它的存在变得越来越短暂,它的持续时间被压缩,商品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成品。持续性的、创造性的、创新性的劳动作为市场价值的基础,对数字经济至关重要。价值增殖过程——货币价值的生产,通过强调劳动的量得以实现,而劳动的量又赋予商品活力。

在我看来,数字经济挑战了劳动力消失的后现代的假设,而商品承担并消解了所有的意义。尤其是互联网是从持续的、不断更新的劳动中提取价值的,而且这劳动十分密集。仅仅制作一个好的网站还不够,你必须不断地更新它,以保持人们对它的兴

趣,避免过时。此外,你需要可更新的设备(一般智力总是人类和他们的机器的集合),而这些反过来又由程序员、设计师和工人密集的集体劳动所推动。就好像生产的加速已经推动了商品从字面上变成半透明物体的地步。与其说商品消失了,不如说它们变得更加透明了,这表明商品对生产和维持它们的劳动力的依赖。通过一个成功的网站展示出来的是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劳动成果,而正是这种劳动改变其产品的景观,才保持了用户不断回访。因此,商品的好坏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

因此,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大量的劳动(正如我们所说,这并不等同于就业),其中只有一部分被风险资本变幻莫测的行事逻辑过度补偿。在维持整个互联网的大量劳动中(从邮件列表流量到Web站点再到基础设施问题),我们可以猜测其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是“免费劳动”。

然而,免费劳动并不一定是剥削劳动。在早期的虚拟社区中,我们都知道,劳动力的确是免费的:建立一个社区的劳动并未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因而它是“免费的”,因为是没有报酬的,但人们也甘愿如此以换取沟通和交流的快乐,因而它是“自由的”,令人愉快的,而不是被强迫的。为了回应成员的要求,这些信息被迅速发布和分享,没有经过任何中介,而早期网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知为何,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的书开始被不公平地指责为中产阶级的自满,他的书描述了,网络观光客战胜网络开发者之前那段美好的时光。^②

免费劳动维持互联网存在,这在许多数字化文献中得到承认。尽管互联网经济动荡不定——昨天是关于社区,今天关于门户网站,明天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用户劳动的概念始终保持着意识形态和物质上的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在互联网潮流的动荡更迭中始终如一。通常持不同意见的评论员总会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如霍华德·瑞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和理查德·哈德森(Richard Hudson),即:最好的网站,在网络上保持可见和繁荣的最佳方式,是将您的站点变成一个不仅可以访问,而且可以以某种方式由其用户构建的空间。^③用户通过

他们的劳动、访问网站的累计时间(从而产生广告)、撰写信息、参与对话以及有时还会跳转到合作者那里来保持网站的活力。在维持美国在线运行的15000名志愿者中,只有少数人反对它,而其他人都留下来了。这样的功能似乎是互联网特有的,不仅可以通过商业化来实现,同时也不会使其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依靠互联网修补工的免费劳动力的“开源”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数字经济中的这种结构性趋势。

关于互联网的辩论,一个有趣特征——并且以某种方式证明了它的男性偏见,在于用户劳动在开源运动的情况下,比在邮件列表和网站上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暴露出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始终与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编写操作系统仍然比仅仅为美国在线免费聊天更值得关注。在1996年志愿者活动的高峰期,尽管有超过3万名“社区领袖”帮助美国在线每月创收至少700万美元。^④然而,尽管如此,开源运动还是比上面描述的更加分散的用户劳动吸引了更多积极的关注。之所以它值得探讨,不是因为我认为它能够比“门户网站”或“虚拟社区”等最新流行的词汇存在更久,而是因为它引发人们讨论以及关注它与整个数字经济的关系。

开源运动是一种旧时已经存在的传统的变体,这种传统要实现共享软件和免费使用软件。对互联网的技术发展,这些软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免费软件意味着用户免费使用软件,甚至不计报酬。共享软件虽然也免费,但这意味着用户有“道德”义务向生产者转发一小笔款项,以维持共享软件运动,使其能够成为替代微软等巨头企业版权软件的经济模式。开源“指的是一种软件开发模式,其中程序的底层代码——源代码,也就是皇冠上的宝石——根据定义可以免费提供给公众,供其修改、更改和无止境再发布”。^⑤

开源运动远非理想主义少数派的实践,而是吸引了媒体和金融界的广泛关注。开源网络服务器Apache是“超过一半的可公开访问的网络服务器程序的首选”。^⑥1999年,风险资本家焦急地参加了开源大会,他们从数字专家那里得知开源运动是必要的,“因为你必须开源才能获得开源开发社

区的好处——近乎即时的漏洞修复、网络的分布式智力资源、日益庞大的开源代码库。”^⑧ Cygnus 等开源公司已经让市场相信,您无须拥有源代码的所有权就可以获利:代码可能是免费的,但技术支持、打包、安装软件、定期升级、办公应用程序和硬件不是免费的:

1998年,当美国网景公司(Netscape)开始“开源”并邀请计算机修补程序员和电脑爱好者来查看其新浏览器的代码、修复错误、改进软件包并重新发布它时,并通过专门的邮件清单就这些可能存在的交换了意见。^⑨网景公司的举动,重新引发了关于数字经济特殊性质的讨论。它是被解读为互联网“礼品经济”的传统?还是说数字资本完全违背了这一传统劫持了开源运动?理查德·巴布鲁克为此称赞道,网景公司的举动是媒介体系架构内力量的标志:网络的技术和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到鼓励其参与者之间的开放合作。作为一项日常活动,用户正在共同构建系统。他们从事“交互式创意”,发送电子邮件,参与列表服务器,为新闻作出贡献,参加在线会议并创建网站……由于缺乏版权保护,信息可以自由调整以满足用户的需求。^⑩

然而,约翰·霍瓦斯(John Horvarth)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网络上提供的“免费东西”,“要么是从一种产品迷上另一种产品,要么就是让你在网络上花费更多时间的产品。毕竟,访问人员和电信公司的目标是让用户在网络上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而不管他们在做什么。目标是让你消耗带宽。”^⑪霍瓦斯声称,网景公司的举动远非证明互联网礼品经济的持续性,而是直接威胁到那些独立生产商,对他们来说,共享软件和免费软件正是网景公司所代表的那些“大型企业”的生存方式: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是小型生产商(其中许多是个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大型企业的推土机般手段的影响。而现在,推土机正在直奔这个竞技场冲来。

至于网景公司,这样的举动具有良好的商业意义,却给软件开发领域的工人带来了麻烦。该公司在199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业绩表现不佳,并且已经暗示要裁员。那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让免费

软件人员进一步推广其产品,让代码爱好者修复并进一步开发其产品呢?网景公司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驯服免费软件这头猛兽以确保利润。^⑫

尽管人们禁不住将网景公司裁员的证据与巴布鲁克礼品经济的乐观主义相提并论,但可能会存在更有效的方法来看待包括开源在内的“理想主义”运动与当前开源公司风险投资热潮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与其说,开源问题代表了先前原生文化整合的时刻,不如说,无论是在没有经济回报的情况下还是在自愿给予的意义上,这表明了数字经济本身对免费劳动力的过度依赖。这包括美国在线社区领袖、开源程序员、业余Web设计师、邮件列表编辑,以及愿意“为卡布奇诺工作”的网奴(NetSlaves),他们只是为了数字工作的兴奋和令人怀疑的承诺。^⑬

这种依赖,几乎是一种附属关系,是资本主义榨取价值机制的一部分,这是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过程不是在资本之外创造然后被资本重新占有,而是一段复杂历史的结果。在这段历史中,劳资关系相互构成、互相纠缠并在福特主义的危机中形成。免费劳动是晚期资本主义固有的劳动欲望,而晚期资本主义是既维持免费劳动又耗尽免费劳动的领域。通过有选择性地但广泛地减少劳动,它可以自我再生产的手段来耗尽免费劳动:从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倦怠综合症到整个文化经济中的缺乏报偿以及剥削。晚期资本主义不占有任何东西:它培育、剥削和耗尽其劳动力及其文化和情感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技术上不可能将互联网上的数字经济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更大的网络经济完全分开。尤其是自1994年以来,互联网始终是一种礼品经济,同时也是一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就是将这种共存误认为是一种良性的、没有问题的对等关系。

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过程并不限于数字经济中最自觉的劳动者。它们是分散的文化经济的一部分,存在于整个互联网及其他领域。从互联网先驱时代到“冒险”时代的过渡,似乎并没有影响这些机制,只是强化了它们并将它们与金融资本联系起来。这一点,在万维网最近的发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五、进入新网络

1999年冬天,《连线》杂志宣布旧网络已死,这仿佛是一则响亮而简单的通告。“旧网络是失业者、梦想家和打破传统的人们重塑自我的地方……新网络不是涉足你未知的领域和失败的事情,而是认真地为电视和网络的内容通过相同的数字网络传输的那一天做准备。”^⑤

新网络由大型互联网企业组成,同时也有让用户劳动的新方法。在“新网络”时代,电视和网络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依赖于观众/用户,并将他们视为打着“真实生活故事”标签的文化劳动提供者。氧气网络(Oxygen)这家媒体公司的高管格里·莱伯恩(Gerry Laybourne)想到了一个名为“他们在想什么?”的假想类节目。这是一部基于现实的小品喜剧,改编自网络上的故事,因为“有趣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⑥正如拜耳公司(Bayers)所补充的那样,“在它被制作出来之前,很难看出这一概念与更搞笑却被格里不屑一顾的节目(比如 America's Funniest)之间的界限。”^⑦

与电视的“真人秀”(包括纪实性肥皂剧、文献纪录片和脱口秀)所产生的丑化节目内容相比,“America's Funniest”这一搞笑节目和以用户为基础的内容之间的区别似乎并不在于“新网络”更严肃的性质。从抽象的角度来看,真人秀节目依赖于观众的创造力与网站依赖于用户的输入的方式二者之间没有区别。与任何其他电视节目相比,真人秀节目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观众和自愿参与者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管理着不可能的事情,即从后现代文化经济中最不情愿的成员身上创造货币价值。那些不产生适销对路风格的人,那些没有足够资格进入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世界中的人,通过将他们承受苦难的能力转换成货币价值。

与互联网上的文化和情感生产相比,“真人秀”似乎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分销此类电视节目的媒介企业)与劳动力(受到哄骗,存在缺陷的不发达地区公民)之间不同的逻辑关系。在真人秀的节目中,作为劳动和景观的价值载体,“受众”总是以某种方式作用于权力/知识的联结中,不允许脱口秀节目参

与者立即实现其价值增殖:你不能让杰瑞·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的嘉宾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独自上电视讲述她的故事(事实上,这看起来太像公共服务广播的声名狼藉的访问时段了)。在脱口秀嘉宾和价值增殖工具之间介入了一系列知识,这些知识通过道德或治愈类话语以及由来已久的传统生产组织使缺陷的主体正常化。所以在演出结束后,嘉宾必须接受观众和主持人的喋喋不休的说教、高高在上的姿态、接二连三的质疑甚至会受到“霸凌”,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以敷衍了事纠正道德的名义进行。

真人秀也属于另一种不同的规模经济:虽然数量越来越多,但与网络上数以百万的页面相比,它们仍然相对较少。就好像传统媒体的中心组织不允许他们把人们的作品变成纯粹的货币价值。人们的表演必须有道德,即使这些道德被他们精彩的表演打破。

然而,在互联网中,这种引导和裁决(责任、义务和权利)的过程被分散到几乎可以容忍任何事情的地步。因此,真人秀节目和一个成功的网站之间的质的区别,不在于后者的民主倾向,而在于前者的剥削性质,更在于真人秀节目中道德话语机制的领域化。这种道德的应用,使互联网上“过度”丰富的材料变得多余,甚至无关紧要。数字经济不太关心道德,它真正关心的是丰富的生产,并且与文化劳动和技术劳动的直接联系,这样就表现出一种分散的、非辩证的矛盾。

六、结论

我假设免费劳动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经济中承担结构性功能,并不是为了让读者对新旧媒体的文化经济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而,这的确是源于一种思考的需要,这种思考需要超越构成当今许多网络辩论的范畴,这一过程必然需要进行大量抽象。尤其是,我从互联网是资本和互联网反对资本之间的矛盾出发进行分析。这种对立比简单的技术恐惧症/技术狂热辩论更具有挑战性。问题不在于热爱技术还是讨厌技术,而是试图厘清互联网是资本的延续还是与资本的决裂。正如本文中所述论证的,互联网两者皆非。它更像是晚期资本主义内在

逻辑的转变,与其说是一种断裂,不如说是普遍的文化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强化,因而这也是一种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揭开互联网是资本主义新式反劳工阴谋的神秘面纱是不够的。我试图绘制一条不同的路径,即一种内在、扁平、但对权力敏感、关乎劳工、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模型。显然,我将建立此模型的大部分灵感,归功于与法国/意大利学者所做研究的联系,归功于福柯(Foucault)、德勒兹(Deleuze)、瓜塔里(Guattari)与意大利自治主义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弗朗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等交流形成的思路,这是一个处在后工业社会的核心,通过政治斗争、流放和政治起诉形成的交流领域。另一方面,在英语邮件清单和网站的控制智能实践中,这种思路已经获得了具体的体现。

这种“内在性”的回归,即将社会、文化和政治联系的扁平化,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内格里、哈拉维、德勒兹和瓜塔里一贯主张的那样,笛卡尔主体的现代主义本体论的解构并不一定会产生后现代理论中最愤世嫉俗的相对主义。超越性的丧失,从外部组织社会这一外部原则的丧失,并不一定会以虚无主义而告终,即丧失与权力打交道的策略。

这样的策略是批判理论无法通过想象得到的。正如意大利自治主义公认的失败所揭示的,批判理论的目的不是制定可以用来指导社会变革的策略。相反,正如文化研究的传统所暗示的,它是关于在已经存在的东西上、在已经发生的文化和物质活动上确立的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提出一种理论,不如说是它确定了一种已经存在于网络文学和在线交流中的趋势。这种趋势,并非数字经济的真相;它必然是片面的,因为它试图坚持对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文化和经济现象持整体性的观点。免费劳动不是在晚期资本主义主体的变化中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真理,而是包含了一系列关键性的矛盾,没有哀叹、庆祝和否认,也没有综合形成一个复杂的物质环境。因此,与其说它关乎真理价值,不如说它关乎相关性,关乎捕捉瞬间的能力,免

费劳动能够推动在硅时代(silicon age)盲区内外不断构建非统一的集体智能。

注释:

① Lisa Margonelli, Inside AOL's "Cyber-Sweatshop", *Wired*, October 1999, p. 138.

② 参见[意]保罗·维尔诺、[意]迈克尔·哈特,《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一种潜在的政治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年;[意]安东尼奥·奈格里:《颠覆的政治:21世纪的宣言》,1989年;《〈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91年。

③ MUD和MOO是一款虚拟游戏。

④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159.

⑤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3, p. 40.

⑥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6, p. 395.

⑦ In discussing these developments, I will also draw on debates circulating across Internet sites. On-line debates in, for example, nettime, telepolis, rhizome and c-theory, are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surplus value engender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a hyper-production that can only be partly reabsorbed by capital.

⑧ 参见 Richard Barbrook, *The Digital Economy*, Nettime, Jun. 1997;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in Josephine Bosma et al.(eds.), *Readme! Filtered by Nettime: ASCII Culture and the Revenge of Knowledge*,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99, pp. 132-138; *The Digital Artisan Manifesto*, Nettime, May 1997.

⑨⑩ Barbrook,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p. 135, p. 137.

⑪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p. xiii.

⑫⑬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p. 35, p. 48.

⑭ 关于独立音乐产业及其与企业文化关系的讨论,参见 David Hesmondalgh, *Indie: The Aesthetics and I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a Popular Music Genre*, *Cultural Studies*, vol. 13, Jan. 1999, pp. 34-61; Angela McRobbie, *British Fashion Design: Rag Trade or Image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1998.

⑮ 参见 The challenging section on work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in Bosma et al., *Readme!*

⑯ Martin Kenney, *Value-Cre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Knowledge Worker*, in Jim Davis, Thomas Hirsch, and Michael Stack(eds.),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apital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1997, p. 93; Tessa Morris-Suzuki, *Capitalism in the Computer*

Age, pp. 57-71.

①⑦参见 Darko Suvin, On Gibson and Cyberpunk SF, in Larry McCaffery(ed.), *Storming the Reality Studio*, London: Durham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49-365; Stanley Aronowitz and William DiFazio, *The Jobless Future: Sci-Tech and the Dogma of Wor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根据安德鲁·克莱门特的说法,信息技术作为泰勒式科学管理技术的延伸,被引入到中层员工而不是文职员工中。参见 Andrew Clement, *Office Automation and the Technical Control of Information Workers*, in Vincent Mosco and Janet Wask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①⑧Barbrook,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①⑨参见 Kevin Robins, *Cyberspace or the World We Live In*, in Jon Dovey(ed.), *Fractal Media: New Media in Social Context*,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6。

②⑩参见 Frank Webster,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②⑪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eds.), *Marxism beyond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33。

②⑫《刑事司法法》(CJA)被普遍认为是一项反狂欢立法,大部分反对它的运动都是围绕“政党权利”组织起来的。参见 Andrea Natella and Serena Tinari(eds.), *Rave Off*, Rome: Castelvechi, 1996。

②⑬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p. 136。

②⑭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两卷书中,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将资本动荡和重新安置身体和文化的过程描述为由“公理化”统治的“解码”运动。全球资本主义的解码力量随后开启了非物质劳动的可能性。参见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1984; Gilles Deleuze,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1988。

②⑮参见 Franco Berardi(Bifo), *La nefasta utopia di potere operaio*, Rome: Castelvechi/DeriveApprodi, 1998, p. 43。

②⑯参见 Kevin Kelly, *Out of Control*,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94。

②⑰Eugene Provenzo, foreword to Pierre Levy,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 New York: Plenum, 1995, p. viii。

②⑱⑲Levy,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13, 1。

③⑰参见 Little Red Henski, *Insider Report from UUNET*, in Bosma et al(eds.), *Readme!* pp. 189-191。

③⑱Paolo Virno, *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 Marxism be-*

yond Marxism, p. 266。

③⑲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209页。

③⑳Paolo Virno, *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 Marxism beyond Marxism*, p. 266。

③㉑③②Paolo Virno, *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 Marxism beyond Marxism*, p. 270, p. 271。

③㉒参见 Lazzarato, *New Forms of Production, Readme!* pp. 159-166; Tessa Morris-Suzuki, *Robots and Capitalism, Cutting Edge*, pp. 13-27。

③㉓参见 Toni Negri, *Back to the Future, Readme!* pp. 181-186;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Women*。

③㉔Andrew Ross, *Real Love: In Pursuit of Cultural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8。

③㉕参见 Barbrook,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④⑰参见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④⑱参见 Arthur Kroker and Michael A. Weinstein, *Data Trash: The Theory of the Virtual Clas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④⑲参见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s, 1994。

④⑳参见 Howard Rheingold, *My Experience with Electric Minds*, in Bosma et al(eds.), *Readme!* pp. 147-150; David Hudson, *Rewired: A Brief(and Opinionated) Net History*, Indianapolis: Macmillan Technical Publishing, 1997。

④㉑参见 Margonelli, *Inside AOL's "Cyber-Sweatshop"*。

④㉒Andrew Leonard, *Open Season, Wired*, May 1999, p. 140。

④㉓④⑳Leonard, *Open Season; Ibid.*, 142。

④㉔这是计算机行业的既定模式,事实上,如果您想在以后获得收益,您可能不得不放弃您的产品。参见 John Perry Barlow, *Selling Wine without Bottles: The Economy of Mind on the Global Net*, in Peter Ludlow(ed.), *High Noon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Conceptual Issues in Cyberspa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p. 23。

④㉕Barbrook,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pp. 135-136。

④㉖John Horvarth, *Freeware Capitalism, Nettime*, Feb. 1998。

④㉗John Horvarth, *Freeware Capitalism, Nettime*, Feb. 1998。

④㉘Ross, *Real Love*。

④㉙Chip Bayers, *Push Comes to Show, Wired*, Feb. 1999, p. 113。

④㉚④㉛Ibid., 156。